

网络时代的地方政府评价与沟通型政治参与

常青松 班兴令^①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其中，规范互联网使用、优化地方政府评价及扩大沟通型政治参与是重要的环节，且沟通型政治参与既能弥补公众选举型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缺陷，也能有效降低社会矛盾冲突导致的维权抗争型参与的可能性，但国内鲜有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运用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旨在探究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互联网使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优化地方政府评价可以分别降低官方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此外，社交娱乐型互联网使用会削弱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而知识信息型互联网使用会强化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因此，针对知识信息型互联网使用较为频繁的公众，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地方政府评价；针对社交娱乐型互联网使用为主的公众，不仅要积极建设回应型政府，还要重点引导其有序政治参与，以消减通过非官方沟通渠道进行的无序政治参与带来的隐患。

关键词：地方政府评价 沟通型政治参与 互联网使用 全过程人民民主
回应型政府建设

①作者简介：

常青松，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班兴令，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硕士研究生。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and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et Era

Qingsong CHANG Xingling BA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at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s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We must improve the system of institutions through which the people run the country and encourage the people'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ffairs", among which standardizing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expanding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important links.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n not only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enthusiasm in public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but als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rights-defending protests resulting from social conflicts and disputes.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of CSS2017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on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net use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finds that optimizing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can separately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channels. In addition, social entertainment-oriented internet use can weaken the suppressive effect of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on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non-official channels, while knowledge-information-oriented internet use can strengthen it. Therefore, for the public who frequently use knowledge-information-oriented internet,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and improve

their evalu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For the public who mainly use social entertainment-oriented interne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to actively build a responsive government, but also to focus on guiding their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s brought by disorder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non-offici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Evaluation; Communica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 Us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Responsiv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一、引言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习近平，2022）公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着力点。（张君，2021）在宏观层面，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而在微观层面，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获得感具有显著影响（汤峰、苏毓淞，2022）。然而，在基层政治参与中，个人利益往往超越了公共利益，对利益的追求经常是公众进行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和动力。（陈家刚，2017）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造成两点弊端：一是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利益导向型的参与动机容易引起抗议、游行、示威等威胁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维权抗争行为；二是公众政治参与尤其是选举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高，而发展基于协商和沟通的民主参与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动员型选举参与积极性不足的情况（陈剩勇，2005），也能及时回应百姓合理诉求，从而有效阻止集体行动式的无序政治参与的发生。总而言之，建立和完善官民之间的沟通机制和渠道，推动有序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对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民主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府是政治参与中的关键一方，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状况的重要指标，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研究表明政府绩效评价或政府满意度均对政治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刘伟、彭琪，2021），反之，也有研究表明政治参与可以影响政府绩效评价（范知智，

2021）。然而，由于政治参与形式的划分尚不统一，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参与之间具体有何关联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参与形式进行深入分析。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并区分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形式。此外，诸多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会对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但互联网使用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不尽相同。（Kim et al., 2013; 王薪喜、孟天广, 2021）鉴于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的不同方面如何调节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差异，为更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机制，引导有序政治参与，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沟通型政治参与：民主选举与维权抗争之间

本文所说的沟通型政治参与指的是相对选举型、抗争型政治参与而言的其他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与党政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反馈的政治参与形式。既往研究较少关注沟通型政治参与，部分研究将其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与其他形式进行比较分析，如胡荣将其命名为利益表达参与，并将其与维权抗争参与和选举参与进行比较。（胡荣, 2008）另有学者将政治参与划分为维权参与、沟通型参与、社区参与和选举参与四种类型。（林健、肖唐镖, 2021）王建武研究的是基于个人利益诉求的参与，包括意见表达参与和维权抗争参与，并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二者的影响。

（王建武，2016）但几乎还没有研究单独针对沟通型政治参与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虽然上述研究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命名有差异，但均体现了利益和意见的沟通和表达，为了简洁和统一，本文一致将其命名为“沟通型政治参与”。

总体而言，即便在具体的命名上存在细微差异，既往研究更多的是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而结合少数据及沟通型政治参与的研究，会发现沟通型参与通常被列入非制度化参与之中。且如前文所言，在选举参与积极性不足，维权抗争型参与扰乱社会秩序、威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沟通型政治参与如加以正确引导，可成为切实有效的公众政治参与方式。总之，沟通型政治参与作为选举参与和维权抗争型参与之间的一种中间型参与形式，既可以保障公众的合法权利，也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冲突，作为一种中间性的润滑剂，值得更多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

然而，既往少数涉及沟通型政治参与的研究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未进行更细致的分类。而基于沟通型政治参与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以探究两者的异同。如此分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指的是公众通过官方渠道（如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或官方媒体渠道）向各级党政部门反映问题、意见或建议，反之，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指的是通过各类非官方媒体平台、社会组织等非官方渠道间接向各级党政部门反映问题、意见或建议。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是官方主导的、可控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形式，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具有不确定性，如不加重视，可能发展成难以控制的维权抗争型参与，威

胁社会秩序。尤其是互联网渠道，有研究表明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对维权抗争型参与有推动作用。（王建武，2016）由此可见，这两种类型具有本质上的差别，将其分开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二）政府绩效评价与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公众和官方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过程，而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作为衡量政府工作的重要指标，同时又是基于公众自身体验的认知和评价，会对其政治参与产生重要影响。有研究发现政府评价越高，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对于社会中上层而言，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较大；对中下层而言，政府评价的影响则更大（崔岩，2020），在该项研究中，政治参与的测量采用多种类型的具体参与形式进行累加，因此既包含了制度化政治参与，也包含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另有研究发现参与过村委会选举投票的公众的政府工作满意度显著高于没有参与过的公众（范知智，2021），而该研究中的政治参与特指基层选举参与。然而，还有研究表明主观绩效评价会显著提高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刘伟等，2021）另外，有研究发现，感知政治绩效是导致个人参与大规模抗议的重要原因（Sing, 2020），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意会加剧抵制、示威和请愿等非常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Stockemer, 2014）。

结合以上几项研究，首先，不难看出区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缺乏政府绩效评价和沟通型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其次，政府绩效评价和政治参与的关系并未完全厘清，不仅不同参与类型之间存在差异，上述研究还表明政府绩效评价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的关系，需要未来的研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前者，即探究政府绩效评价和沟通型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假设是，基于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导向，即较为具体的、与公众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因素促进其进行沟通型政治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与制度化的选举参与相比，更可能的是政府绩效评价影响了沟通型政治参与而非相反。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1：地方政府评价会显著影响公众的沟通型政治参与。

沟通型政治参与在既往研究中并未区分官方和非官方渠道，一并划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类型之中，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往往被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替代形式。本文区分了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但地方政府评价对这两种类型的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具体而言，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与制度化政治参与有相似之处，具有官方性质，由政府主导，有一定制度性和程序性。因此，在沟通型政治参与归类不明确的情况下，本文分别结合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特点，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并进行比较和检验。

假设 2a：地方政府评价越好，越有可能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型政治参与。

假设 2b：地方政府评价越好，越不可能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沟通型政治参与。

此外，诸多研究表明，维权抗争型政治参与和较低的基层政府信任和公共政策满意度密切相关（卢海阳等，2016；柴玲、尉建文，2018），而这些因素往往与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有着直接关联（Wang,

2016; He & Ma, 2021; Goldfinch et al., 2022）。对于非官方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笔者认为除了参与形式的对抗性强度差异之外，该参与形式与维权抗争型政治参与类似。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地方政府评价越好，越不可能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沟通型政治参与。

（三）“强化”抑或“削弱”：互联网使用的调节作用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政治参与越来越离不开互联网的影响，政治参与研究已经无法忽视互联网的作用。然而，互联网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乐观派认为互联网是推动公众参与的积极力量，悲观派则认为在个人功利主义传播和数字鸿沟的阻碍下，互联网将会助推公众参与走向衰落。乐观派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互联网传播知识信息的功能，认为这有助于公众参与。但这两种观点都把互联网视作一个整体，忽视了使用方式和效果的差异性和复杂性。（郝龙，2020）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会促进青年网民的政治参与，其中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线上政治表达来实现。（孟利艳，2022）但该研究中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划分不够明确，如将“向村委会、居委会、业主委员会提意见”与“参加抗议或请愿活动”、“参加集体上访”同归为线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农村居民的研究也表明，互联网的娱乐性使用会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增加，但信息性使用会促进更加和谐的政府 - 民众关系，进而消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边晓慧、苏振华，2020）虽然该项研究指出对互联网使用内容的划分和政治参与

类型划分的重要性，但其仅研究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未区分沟通型政治参与与抗争型政治参与的差别。还有研究发现媒介娱乐内容偏好对政治参与无显著影响，但政治内容偏好会促进政治表达。（林奇富、殷昊，2020）

国外多项荟萃研究也发现，互联网使用的不同内容对政治参与的不同类型的影响各异。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直接取决于其政治用途（Boulianne & Theocharis, 2020），如新闻类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强于非新闻类使用（Chae et al., 2019）。互联网使用在弱化选举型参与的同时，促进了活跃分子的参与活动。（Huang et al., 2017）上述诸多研究均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不仅会因互联网使用的具体内容而异，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之间也不尽相同。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在不同互联网内容使用的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为 2017 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 数据。该数据来自于全国性的 PPS 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该数据不仅包含了基本人口特征变量，还涵盖了大量与政治社会态度、行为和互联网使用相关的变量。为了探究互联网使用在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为

网民群体，通过问卷问题“您平时上网吗？”进行筛选，回答“上网”的个案入样。根据数据给定的抽样权数进行加权处理后，网民总样本量为 5117，由于缺失值比例较小，缺失个案采用列表删除的方式进行处理。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参照林健和肖唐镖（2021）的命名和测量方式，重点研究沟通型政治参与，并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其中，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用问卷题目“最近 2 年，您是否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进行测量，“参与过”则编码为 1，“没有参与过”则编码为 0。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用问卷题目“最近 2 年，您是否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进行测量，同理，“参与过”则编码为 1，“没有参与过”则编码为 0。

2. 自变量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有三种形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内部评价，二是外部社会组织基于客观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三是自下而上的基于满意度的公民参与评价，而公民参与评价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贾晋、李雪峰，2017）因此，本文采用第三种即基于公民满意度的方式对自变量“地方政府评价”进行测量，主要是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评价。具体问题为“总的来说，您认为地方政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选项分为“很不好”“不太好”“比较好”和“很好”4 个等级，依次编码为 1-4。

3. 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了互联网使用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是否调节了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问卷问题涉及互联网使用的6项不同的内容，测量被访者使用这些内容的频率，0-5依次为“从不”“一年几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周多次”“几乎每天”，对这6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交娱乐型使用”和“知识信息型使用”，详见表1。

4. 控制变量

参照既往研究，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收入、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负面生活事件、政治效能感。其中，政治效能感变量参考胡荣的做法（胡荣，2015），对六个关联题项进行因子分析，得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详见表2。各变量描述统计情况详见表3。

表1 互联网使用因子分析

项目	社交娱乐型使用	知识信息型使用
1. 浏览政治新闻	-0.175	0.832
2. 浏览娱乐新闻	0.394	0.613
3. 查找资料	0.247	0.693
4. 聊天交友	0.676	0.024
5. 玩网络游戏	0.667	0.024
6. 听音乐 / 看视频 / 读小说	0.706	0.179
特征值	2.087	1.148
累积方差解释 (%)	27.460	53.916

注：KMO=0.710，Bartlett 检验 Sig<0.001。

表 2 政治效能感因子分析

项目	外在效能感	内在效能感
1. 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	0.699	0.047
2. 村（居）委会根本不在乎和我一样的普通村（居）民的想法	0.774	0.041
3. 我有能力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	-0.265	0.787
4. 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	0.366	0.698
5. 参与政治活动没有用处，对政府部门不能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	0.670	0.430
6. 我的言论自由会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限制	0.631	-0.090
特征值	2.261	1.181
累积方差解释（%）	35.647	57.379

注：KMO=0.679，Bartlett 检验 Sig<0.001。

表 3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个案数	百分比	值区间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因变量						
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	0= 无	4740	92.7			5116
	1= 有	376	7.3			
非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	0= 无	4873	95.3			5116
	1= 有	243	4.7			
自变量						
地方政府评价			1~4	2.71	0.68	4978
调节变量						
互联网使用	社交娱乐		-2.89~2.12	0	1	5078
	知识信息		-2.81~1.63	0	1	5078
控制变量						
性别	0= 女	2391	46.7			5117
	1= 男	2726	53.3			
年龄	17-34 岁	2901	56.7			5117
	35-59 岁	2065	40.4			
	60 岁以上	151	2.9			
受教育年限			0~19	11.95	3.42	5112
城乡	0= 乡	1797	35.1			5117
	1= 城	3320	64.9			
收入对数			0~14.22	8.09	4.32	5025
婚姻状况	0= 无配偶	1602	31.3			5114
	1= 有配偶	3512	68.7			
中共党员	0= 否	4455	87.1			5116
	1= 是	661	12.9			
负面生活事件	0= 无	1328				
	1= 有	3786				
外在效能感			-2.82~2.83	0	1	4618
内在效能感			-3.16~2.97	0	1	4618

（三）分析策略

因变量“沟通型政治参与”为两个二分类变量，所以选择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先分别分析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探究二者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将互联网使用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的方式分别探究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和知识信息型使用在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及其差异性。

四、数据结果

（一）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 4 报告了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 为只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地方政府评价”，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评价越好，公众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就越小 ($EXP(B)=0.710, P<0.001$)，表明地方政府评价是导致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假设 1 和假设 2b 通过检验，而作为假设 2b 的竞争性假设的假设 2a 未得到验证。

此外，模型 2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男性网民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比女性更大；与 60 岁以上的老年网民和 34-59 岁的中年网民相比，17-34 岁的青年网民参与官方渠道沟通的可能性更低；经历负面生活事件会增强网民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内在效能感会显著促进网民进行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但外在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受教育年限、收入、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则对官方渠道沟通

型政治参与无显著影响。

表 4 的模型 3 报告了互联网使用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在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可以看出, 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越频繁, 网民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的几率就越小 ($EXP(B)=0.865, P=0.027$), 反之, 知识信息型使用越频繁, 网民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越大 ($EXP(B)=1.231, P=0.004$)。然而, 无论是社交娱乐型使用 ($EXP(B)=0.955, P=0.572$) 还是知识信息型使用 ($EXP(B)=0.968, P=0.704$), 均不显著调节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 4 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EXP(B)	P	EXP(B)	P	EXP(B)	P
常量	0.019	<0.001	0.055	<0.001	0.030	<0.001
控制变量						
男 (参照类 = 女)	1.577	<0.001	1.513	0.001	1.455	0.004
35-59 岁 (参照类 = 17-34 岁)	1.502	0.002	1.607	0.001	1.452	0.010
60 岁以上 (参照类 = 17-34 岁)	1.773	0.073	1.973	0.037	1.805	0.077
受教育年限	0.992	0.667	0.987	0.517	0.971	0.156
城 (参照类 = 乡)	0.939	0.612	0.954	0.708	0.949	0.679
收入对数	1.031	0.078	1.030	0.089	1.023	0.190
有配偶 (参照类 = 无配偶)	1.425	0.027	1.339	0.070	1.264	0.150
党员 (参照类 = 非党员)	1.339	0.076	1.338	0.082	1.310	0.110
负面生活事件 (参照类 = 无)	1.866	<0.001	1.690	0.001	1.680	0.001
外在效能感	0.906	0.081	0.947	0.347	0.926	0.191
内在效能感 1.323	1.323	<0.001	1.326	<0.001	1.293	<0.001
调节变量						
互联网使用						
社交娱乐型使用					0.865	0.027
知识信息型使用					1.231	0.004
自变量						
地方政府评价				0.710	<0.001	0.705
交互项						<0.001

地方政府评价 * 社交娱乐型使用		0.955	0.572
地方政府评价 * 知识信息型使用		0.968	0.704
样本量	4541	4470	4441
-2 对数似然值	2291.052	2226.841	2190.555
卡方值	119.978	131.367	143.335
伪 R ²	0.063	0.071	0.078

注：地方政府评价用的是中心化后的数据，伪 R² 报告的是内戈尔科 R 方，下同。

（二）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

表 5 为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2 在控制模型 1 中的变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评价的提升显著降低了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EXP(B)=0.725, P=0.002)，该结果支持了假设 3。结合两个模型，还可以发现男性网民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显著大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网民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越大；经历负面生活事件能显著增大网民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内在效能感的提升也会显著增加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但外在效能感的影响不显著。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在网民群体中不存在年龄差异和城乡差异，且网民的收入状况、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不存在显著影响。

表 5 的模型 3 报告了互联网使用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在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可以发现，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 (EXP(B)=1.268, P=0.008) 和知识信息型使用 (EXP(B)=1.604, P<0.001) 均会显著促进非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但交互项的结果表明，二者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社交娱乐型使用削弱了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

用 ($EXP(B)=1.295, P=0.013$), 而知识信息型使用增强了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 ($EXP(B)=0.776, P=0.048$), 结合前文结果, 假设 4 得到支持, 即互联网的不同内容在地方政府评价对两种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

表 5 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EXP(B)	P	EXP(B)	P	EXP(B)	P
常量	0.008	<0.001	0.017	<0.001	0.009	<0.001
控制变量						
男 (参照类 = 女)	1.947	<0.001	2.002	0.001	2.028	<0.001
35-59 岁 (参照类 = 17-34 岁)	0.722	0.057	0.714	0.051	0.813	0.261
60 岁以上 (参照类 = 17-34 岁)	0.869	0.771	0.865	0.776	1.211	0.712
受教育年限	1.104	<0.001	1.111	<0.001	1.072	0.007
城 (参照类 = 乡)	0.874	0.351	0.871	0.343	0.854	0.285
收入对数	1.008	0.653	1.008	0.651	0.996	0.825
有配偶 (参照类 = 无配偶)	1.038	0.827	1.050	0.774	1.118	0.524
党员 (参照类 = 非党员)	0.909	0.648	0.852	0.453	0.876	0.541
负面生活事件 (参照类 = 无)	1.565	0.009	1.503	0.020	1.531	0.016
外在效能感	0.873	0.047	0.908	0.170	0.898	0.134
内在效能感 1.323	1.475	<0.001	1.496	<0.001	1.431	<0.001
调节变量						
互联网使用						
社交娱乐型使用					1.268	.008
知识信息型使用					1.604	<0.001
自变量						
地方政府评价			0.725	0.002	0.775	0.030
交互项						
地方政府评价 * 社交娱乐型使用					1.295	0.013
地方政府评价 * 知识信息型使用					0.776	0.048
样本量	4541		4470		4441	
-2 对数似然值	1754.767		1715.096		1662.587	
卡方值	103.047		120.203		165.578	
伪 R ²	0.067		0.079		0.108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CSS2017全国性调查数据探究了地方政府评价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作为单独针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研究，本文将沟通型政治参与划分为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进行比较，且研究目的不仅局限于地方政府评价对这两种类型的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差异，还在此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探究互联网使用的内容在地方政府评价对两种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为引导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科学民主决策，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参考，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首先，地方政府评价会对沟通型政治参与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评价越好，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几率均越小，表明我国网民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和对地方政府工作评价的好坏有着密切关联。该结论与既往研究结论表面上看并不一致。然而，本研究中的政治参与特指沟通型政治参与，而崔岩的研究中的政治参与是对各种类型的政治参与的累加（崔岩，2020），刘伟等人的研究中的政治参与特指制度化政治参与（刘伟等，2021）。由此看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的上述主要研究结论为既往研究作了补充，不过也需要未来更多的比较研究和针对性研究进行验证和完善。

更重要的是，本文还发现了互联网使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这为精准施策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首先，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越频繁，网民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但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大，这与既往研究中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会促进非制度化政

治参与的研究结论类似（边晓慧、苏振华，2020；孟利艳，2022）。其次，社交娱乐型使用并未显著调节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的抑制作用，但其显著削弱了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以上结果说明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会加剧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同时会削弱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且对于社交娱乐型使用较频繁的公众而言，提升地方政府评价对降低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效果有限。有研究表明，基于个体利益表达的政治参与是青年群体的主要动机，其政治参与行为不局限于政治主题，还包括对社会利益的关切，诉求呈现“多元化”趋向，但政治情感总体比较积极，而通过互联网表达诉求成为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靳娜、张爱军，2020）这说明，对于青年网民来讲，包括地方政府评价在内的政治认知态度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影响有限，需要更多关注该群体的其他维度的具体诉求，同时也表明网络政治参与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而是可以有序引导的。

此外，互联网的知识信息型使用越频繁，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均越大。既往研究发现互联网通过技术赋权，提升了青年网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政治参与（方俊、蒋艳，2020），与本研究结论相符，说明知识信息型使用会促进政治参与而非削弱政治参与。此外，本文发现知识信息型使用虽然无法显著调节地方政府评价对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但显著增强了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的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互联网的知识信息型使用会同时加剧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但对于知识信息型使用较频繁的网民而言，提升其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可以有效降低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对既往研究

中信息性使用会促进更加和谐的政府 - 民众关系，进而消解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现进行了补充。（边晓慧、苏振华，2020）另外，国外的研究表明，在线新闻媒体如不受政府部门限制，可能会将政治不满放大，从而促进非常规的政治参与，如抗议等 (Xia & Shen, 2018; Karakaya & Glazier, 2019)，社交媒体上的新闻接触尤其会促进政治参与 (Stromback et al., 2018)。因此，对于知识信息型使用较为频繁的网民而言，除了提升其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之外，还应对互联网平台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信息进行必要的筛查，防止社会负面事件的无序放大。

本文的以上研究结果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一，地方政府应积极履行各项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公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从而降低沟通型政治参与尤其是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造成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疏离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的重要因素。当前，由于诸多因素限制，缺乏地方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有效对话机制，造成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地方政府要赋予公众充分的意见表达机会，以民为本，以服务为导向，建设服务型政府。（郭斌，2017）其二，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评价只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仅仅提升公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地方政府工作评价提升无法完全回避公众的利益诉求问题，尤其对于那些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比较频繁的公众而言。实际上，回应百姓的诉求和关切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研究表明，拓展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对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陈云松，2013）因此，除了提升地方政府绩效之外，还应积极回应百姓合理诉求，积极开展有序的官民互动的“回应性参与”，建设“回应型”政府。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社交娱乐型使用和知识信息型使用均会显著促进非官方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并调节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回应性参与和回应型政府建设不能忽视互联网技术的重要作用。互联网技术不仅能给政府赋能，也可以给公众赋权，网络政治参与拓宽了传统公众政治参与渠道，同时为政府部门收集了解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提供重要平台，政府与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形成良性互动，将有助于优化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郭小安，2008）网络政治参与还促进了政府回应力的增强，渠道的多元化、回应意识增强、速度加快、质量提升（朱仁显、樊山峰，2017），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董人菘、袁崇坚，2020）。此外，研究表明，数字使用鸿沟影响政治参与，但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汤志伟、叶昶秀，2022）青年群体是互联网使用的主力军，老年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则面临数字鸿沟，因此建设回应型政府要兼顾线上和线下渠道。当前网民无法代表大众，无论是人口特征还是政治态度，不可盲目听从网络民意。（林奇富、殷昊，2020）总而言之，回应型和服务型政府建设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建立健全网络问政、协商、沟通渠道，将其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同时也要完善线下沟通渠道和机制，逐渐取代制度外的非官方沟通渠道，统筹纳入官方沟通渠道之中，这不仅可以即时回应百姓诉求，也可以减少制度外维权抗争事件的发生几率，从而有助于社会和谐稳定。

但本文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而非追踪数据，因此无法进行因果推断。其次，由于原始数据局限，本文

对于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测量并未穷尽，如通过社会组织进行的沟通型政治参与未被纳入到本研究之中，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探讨。最后，本文对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测量为两年的追溯期，这会导致一定的偏差，而时间段的差异可能会使地方政府评价和沟通型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这需要未来长期的追踪数据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

即便如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价值层面，其一，本文界定了“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概念，并进行了“官方渠道”和“非官方渠道”的划分，对其开展细致的针对性研究，为政治参与研究领域做出一定拓展，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其二，本文的调节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的不同方面对地方政府评价影响沟通型政治参与的调节作用不尽相同。社交娱乐型使用会促进非官方渠道沟通型参与，同时会削弱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知识信息型使用会促进官方和非官方两种渠道的沟通型政治参与，同时强化地方政府评价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抑制作用。该结果支持了“互联网会促进政治参与”的乐观派观点，反驳了“社交娱乐使用会弱化政治参与”的悲观派观点，同时说明了划分互联网使用类型和政治参与类型的必要性。在现实意义层面，其一，地方政府评价提升会显著削弱沟通型政治参与，启示我们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政府绩效和公众满意度；其二，互联网使用对非官方渠道沟通型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提醒我们要直面网络政治参与问题，建设回应型政府，切实听取公众的合理诉求。同时，针对那些社交娱乐型使用较为频繁的公众，除了提升政府服务和评价之外，还要进行必要干预和正确引导，维护网络政治参与秩序，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 边晓慧, & 苏振华. (2020). 互联网使用对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 SEM 的政治价值观中介效应检验.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5), 146-156.
- 柴玲, & 尉建文. (2018).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89-95.
- 陈家刚. (2017). 协商民主: 制度设计及实践探索.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1), 60-65, 127.
- 陈剩勇. (2005). 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 浙江社会科学, (1), 26-30.
- 陈云松. (2013). 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 CGSS2006 的工具变量分析. 社会, (5), 118-143.
- 崔岩. (2020). 当前我国不同阶层公众的政治社会参与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6), 9-17, 29.
- 董人菘, & 袁崇坚. (2020). 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影响. 云南社会科学, (5), 92-95, 163.
- 范知智. (2021).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城乡公众的政治绩效评价? ——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研究.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4), 38-49.
- 方俊, & 蒋艳. (2020). 技术赋权与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政治参与.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6), 19-27.
- 郭斌. (2017).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价值偏差及其消解——基于商谈民主的视角.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37-142.
- 郭小安. (2008). 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 理论探索, (3), 127-129.
- 郝龙. (2020). 互联网会是挽救“公众参与衰落”的有效力量吗? ——20

-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争议与分歧 . 电子政务 , (6), 107-120.
- 胡荣 . (2008).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 . 社会学研究 , (5), 142-159, 245.
- 胡荣 . (2015). 中国人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和警察信任 . 社会学研究 , (1), 76-96, 243.
- 贾晋 , & 李雪峰 . (2017).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 10 省 1336 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 公共行政评论 , (3), 164-183, 217-218.
- 靳娜 , & 张爱军 . (2020).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多元诉求与内在张力——基于中青网的大数据分析 .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 (3), 59-66.
- 林健 , & 肖唐镖 . (2021). 社会公平感是如何影响政治参与的?——基于 CSS2019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6), 10-20.
- 林奇富 , & 殷昊 . (2020).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 代表性视角 . 学术月刊 , (10), 77-88.
- 刘伟 , & 彭琪 . (2021). 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基于 2019 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分析 . 政治学研究 , (2), 53-65, 188-189.
- 刘伟 , 肖舒婷 , & 彭琪 . (2021). 政治信任、主观绩效与政治参与——基于 2019 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分析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6), 1-9.
- 卢海阳 , 郑逸芳 , & 黄靖洋 . (2016). 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 16 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 中国行政管理 , (8), 92-99.
- 孟利艳 . (2022). 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与青年线下政治参与——基于对河南省 18 个地市的调查 . 青年研究 , (4), 70-80, 96.

- 汤峰, & 苏毓淞. (2022). “内外有别”: 政治参与何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 *公共行政评论*, (2), 22-41, 195-196.
- 汤志伟, & 叶昶秀. (2022). 数字使用鸿沟与公民政治参与——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 *情报杂志*, (9), 129-135, 111.
- 王建武. (2016). 互联网使用、在线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 *青年研究*, (6), 32-40, 92.
- 王薪喜, & 孟天广. (2021).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 *社会*, (1), 178-206.
-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 张君. (2021). 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人民民主的新形态. *政治学研究*, (4), 11-17.
- 朱仁显, & 樊山峰. (2017). “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回应问题研究. *长白学刊*, (6), 42-48.
- Boulianne, S., & Theocharis, Y. (2020). Young people, digital media, and engagement: A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8(2), 111-127.
- Chae, Y., Lee, S., & Kim, Y. (2019).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amining main and moderating effect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1), 35-54.
- Goldfinch, S., Yamamoto, K., & Aoyagi, S. (2022). Does process matter more for predicting trust in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cess, in local government in Japa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 He, A. J., & Ma, L. (2021). Citizen participation, perceived public service

- performance,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health policy reforms in Hong Kong.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44(3), 471-493.
- Huang, M. H., Su, C. H., Han, R. X., & Weatherall, M. (2017). How does rising internet usage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ast Asia? Explaining divergent effects. *Asian Perspective*, 41(4), 527-558.
- Karakaya, S., & Glazier, R. A. (2019). Media, inform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importance of online news sources in the absence of a free pres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olitics*, 16(3), 290-306.
- Kim, Y., Chen, H. T., & De Zuniga, H. G. (2013). Stumbling upon news on the internet: Effects of incidental news exposure and relative entertainment use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6), 2607-2614.
- Sing, M. (2020). Expla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nti-anthoritarian protests in Hong Kong.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53(4), 2-21.
- Stockemer, D. (2014). What drives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two level stud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1(2), 201-211.
- Strömbäck, J., Falasca, K., & Kruikemeier, S. (2018). The mix of media use matter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news repertoires on offline and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5(3), 413-432.
- Wang, C. H. (2016).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ast Asia. *Social Science